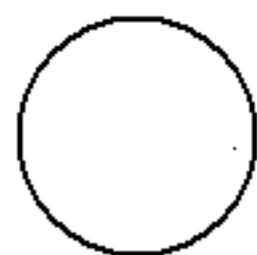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6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

目 录

社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1)

在人民公社中贯彻执行按劳分配
的原则 (4)

关于“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許立群 (6)

談洋土并举 曾希圣 (20)

在工厂中开展群众运动的几个
問題 石西民等 (25)

短 困难的兩重性 李 锐 为 (34)

論 主流和支流的辯証法 高 禹 (36)

共产国际成立四十周年 程 容 (88)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
成本核算的商榷 赵 璧 (42)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全国的工人农民正在为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积极奋斗。在这样的時候，許多省級、市級、地委級和县級的领导干部直接参加了工厂农村的劳动，这对于全国的劳动人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它不但可以激励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扫除官僚主义的积习，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保证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活动，并且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步结合开辟了一条道路。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形成剥削制度的社会基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尽管人们在职务上的分工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工作干部，不论他所负的责任多么重大，在社会地位上，都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完全平等的。

我们的干部是从群众中产生的，而且要不断地从群众中产生新的干部。干部所做的工作完全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根据，除了努力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以外，他们的工作中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为了使人民的事业取得胜利，就必须有这样一批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接受人民所授予的任务，在各个方面领导人民前进。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观点列宁曾经多次加以论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曾再三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应当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劳动人民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对选民负责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列宁努力寻求使国家工作人员同普通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道路。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同工人农民一起去劳动。列宁说：“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必须在劳动中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也就是我们党中央要求干部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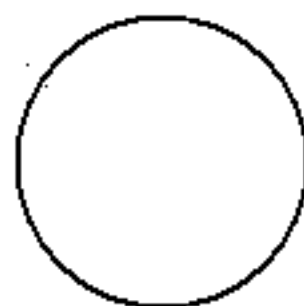
体力劳动的基本出发点。

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国家工作干部和普通的工人农民群众之间的一定的分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正因为干部和群众之间有职务上的分工，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并且不能常常互相密切地接近，他们之间也就有互相隔离的可能。在这里，还不能不考虑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在旧社会中的官民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跟这种官民关系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不过，我们的干部，如果不经常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或者受到了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而不注意去加以克服，他就会失去一个人民勤务员所应有的本色。所以，党中央特别强调要教育干部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使干部不因为自己在社会分工中担负不同的职务，而自以为具有特殊的身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贯彻执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正是在这方面教育我们的干部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也是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干群关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时，党中央就曾发出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意义，并且把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党中央在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中这样地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党在三十年来，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在此以后，中央又继续发出指示，要求各个部门中的各种干部，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参加体力劳动。

全国广大干部用实际行动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不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分批地在一定时期内到农村或工厂中去参加劳动。干部下放到农村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公社社员，下放到工厂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和其他社员、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同样地分担生产任务，同样地遵守劳动纪律。在军队中的干部，包括高级指挥员在内，也分批下放到连队中，当普通的士兵。在我们的广大干部中，参加体力劳动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并且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于克服脱离群众、脱



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十分显著的效果。许多干部反映，在参加了体力劳动之后，由于深入了实际，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置身于群众之中，干部和群众就更能相互了解，心心相印。一些过去不容易听到的事情听到了，一些过去不容易看到的事情看到了，群众在想什么，要求什么，能够及时地了解了。许多有关生产、工作和群众生活中的新问题，都能够较快地发现，及时地和群众商量，得到解决。干部有了实际参加生产的经验，对于领导生产工作和其他工作，也就做得更具体、更细致了。

干部作风的改进，必然会反过来对广大群众发生重大的影响。旧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和旧社会的官民对立的关系，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很容易就能扫除干净的。群众如果看到了有些干部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就更有可能对于我们的干群关系发生错误的了解。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于扫除群众中残存的对待体力劳动和干群关系的某些旧的看法，起了重大的作用。人民群众通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了解他们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进一步正确地认识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许多公社和企业中，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给了群众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显著地提高，群众对于干部的信任和爱戴也大为增强。

干部密切地联系群众，群众由衷地信任干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局面，这是我们任何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最根本的关键。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但在现时有重要意义，而且如前所说，在今后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我们的干部，既然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就应该按照需要，随时回到群众中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经验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日益普遍地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必将逐渐消除。因此，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干部当工人，干部当农民，这样的制度，应当成为我们国家的一种根本制度，继续坚持下去。我们有了——九五八年的丰富经验，在一九五九年应当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更好的安排，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人民公社中 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則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正确地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質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各地在整頓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都把解决分配問題，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許多省提出，在分給社員的工資制部分实行“死級活評”的办法，人民公社按原来評定的工資級別，把工資发給各生产队，生产队对社員的劳动实行評工記分，根据每个社員（包括未評級的）每月評定的工分发給工資。这个办法接受了过去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評工記分的經驗，可以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人們对于社会产品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归根結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取决于所有制。在人民公社中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当然也就取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发展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我国的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質的，而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在一定时期內，它也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性質的，而是集体所有制性質的。因此，在人民公社內部的产品分配方面，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是完全必要的。

在人民公社中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則可以造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便于统计和监督生产，合理地进行劳动分配，建立生产責任制和經濟核算制。这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設和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按劳分配，就是拿劳动作为分配社会消費产品的尺度，这同不劳而获来作比較，就是最大的平等。当然，实行这种分配原則，还会有收入多少的差別。但是这种差別，不同于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差別，也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之前由于农民內部階級分化而产生的贫富差別，而只是由于劳动的数量質量不同和生产基础的不同而产生的队与队之間和队员个人之間收入多一些和少一些的差別。

这些差別，一部分在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永远存在（因为人的需要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另一部分在共产主义社会将归于消失，但是在今天都必须承認和應該承認。承認差



别，正是为了准备条件，逐步消灭那些将来可以消灭、应该消灭的差别。这些差别的消灭，只有通过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人民公社的经济的强大高涨，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村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才能够做到。如果简单化地企图采用拉平分配的方法来消灭这种差别，就要犯平均主义的错误，对社会生产和人民公社运动就只能起消极的破坏作用。

人民公社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进行分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的关系，归根到底，这是我们党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积累和消费都要增加，这是分配的基本原则。生产大跃进了，积累要增加，这是必需的；但是积累的增加不能过多过急，积累和消费，必须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党中央规定，要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也不比上年减少，这就是一个最低的界限。在消费部分的分配中，集体消费部分和个人消费部分也要有正确的比例，而且个人消费部分应当占主要的地位。集体消费部分是要逐步增长的，但是这种增长同样也不可过多过急。在个人消费部分中，是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这个制度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萌芽，我们应该积极地爱护和支持这种萌芽的生长。但是，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也要有正确的比例。如六中全会决议所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资部分将是主要的，并且要有较快的增长；工资等级应当保持适当的差距，但是不要过分悬殊。

有的人怀疑，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同“政治挂帅”是否有矛盾。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什么叫政治呢？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这首先就是承认并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且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正确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实行这个分配制度，并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使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想，认识到个人的目前利益和集体的长远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因此，在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以便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在劳动中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政治同经济应当统一起来，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原则同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原则应当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觉悟的提高，有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关于“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許立群

要研究“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方针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要研究这个方针，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方针是革命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一 关于“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認識，是辩证法的实质。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的现象。

在国民经济中，有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工业和农业。

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即以生产生产资料为主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部门。

从管理的体制上区别，有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

在生产规模上，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在生产技术上，有洋法生产和土法

生产。

在领导工作中，有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

在工业的各产业部门之间，有中心环节和其他环节，在我国目前即钢铁生产和其他各部门的生产。

这里列举的矛盾关系，都见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论述“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部分。

“用两条腿走路”，这个比喻，和其他一些非常聪明和巧妙的比喻一样，是生动的和形象化的，而且，在人们容易理解的形式之下，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关于革命辩证法的对立面统一的思想。

二 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

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



一性。一切矛盾着的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研究这一段话，对于理解“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必要的。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它们是互相依赖着的，离开了其中的一方面，社会生产就不能进行。

但是，工业和农业又是矛盾着的。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了极尖锐的程度。列宁说，资本使农业摆脱了封建制度，可是“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主要在工商业范围内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他指出，“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得到了反映，列宁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流行的思想，就是工业和农业是对立的，……”^①

工业和农业对立，城市和乡村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就被消灭了。但是，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之间再也不存在着矛盾，那就不正确了。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不过这种矛盾的性质，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商品生产者分开，造成互相对立、互相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工农业生产单位联合成为一个有计划的国民经济的整体，使它们服从统一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般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对农业的依赖，主要表现在工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给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供给粮食，要求农业给日益增长的工业供给原料。农业对工业的依赖，主要表现在要求工业供给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技术装备，要求工业供给化学肥料和农药等等。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双方，互以对方的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条件的情况。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互相矛盾，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一定时期内，它们分属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

^① 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



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等等。我們这里着重說說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矛盾。因为必須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才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最有效地推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农业发展的速度这两个对立着的側面，在形而上学或“用一条腿走路”的人看来，是互相排斥或对立着的。他們認為既要迅速地发展工业，就必须把人力、物力、財力尽量投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来，甚至把发展农业的必要資金，也用来增加工业的积累。这样作的結果，工业虽然在短时期内发展得較快，但是农业对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就势必跟不上去。为了解决农业的落后，他們認為只有等到工业大量提供农业机械化的装备之后才有可能，所以，結論还是只有更快地发展工业。有这种認識的人，他們虽然也抽象地承認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他們認為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听任农业落后，也即認為可以只用一条腿走路。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去做，农业的发展就会很慢，輕工业也会发展得很慢，这既影响到积累的来源，又影响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重工业虽然发展了，但实际上并不見得真正很快。

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从革命辯証法的立場出发的。这一方針認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既是互相对立或互相排斥，又是互相渗透着的。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該多投进人力、物力和財力，以

求得尽量快的发展。但是，不能認為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是不关重要的，不能認為只有工业能推动农业前进，而农业就不能推动工业前进。这一方針認為，人們應該按照正确的比例来发展它們。农业发展了，不仅可以保證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而且可以更多地积累資金，提供更广大的工业市場，从而推动工业更快地发展。形而上学孤立、静止地看問題，所以看不到事物的这种辯証的发展。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在我国这样有五亿多农业人口的国家里，发展农业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更是显著。我国五亿多农民，是工人階級最亲密的同盟軍，是一支极伟大的力量。这一点，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是如此，在經濟建設斗争中也是如此。为了胜利地实现我国一切重大的政治經濟任务，就必须把这一支伟大同盟軍的积极性充分地調动起来。只要我国的农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生产（特别是农业机械、化肥、燃料、运输工具、建筑材料等）和輕工业生产，都会由于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場的推动，和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劳动大軍强有力的支援（包括供給粮食、原料、积累資金），而得到极巨大的发展。这一真理，已經被几年来的事实所逐步証明了。我国工业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显著的增长（一九五三年的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內，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七，一九五六年增长百



分之三十一)①,是和前一年的农业丰收有着密切联系的。我国的工农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季和一九五八年春季农业大跃进开头的。农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推动了工业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实现了我国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今后工农业继续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以,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工农业互相推动的作用,充分调动我国五亿多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以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能够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是同样适用的。人们如果忽视公社工业化的重要性,就会减低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但是,如果过多地把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到工业中去,这就会损害农业的发展,结果就会反过来损害到公社工业化的自身。事实证明,只有农业跃进了,公社才可以从农业方面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到工业方面去。如果农业不跃进,很多的人势必要为吃饭(粮食)而奔忙,那里谈得到抽出力量去发展工业呢?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和这一方针密切相联系着的,还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两条方针包含着以下的含义:第一,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既要保证它们同时并举,又要保证工业的主导作用;第

二,在工业内部,既要保证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时并举,又要保证重工业对轻工业的主导作用。

这两条方针是密切联系着的,这是因为:首先,这两条方针所要处理的矛盾问题有共同的地方;它们都要解决如何才能以高速度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又都要解决高速度的建设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矛盾。其次,轻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八十来自农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第一部类),要比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第二部类)增长得快。第一部类的优先增长,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这是一条客观的经济规律。有了更多更好的劳动工具和原材料,才能使一切生产部门采用更新的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没有重工业的重大发展,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无从实现;轻工业也因为不能改进和增加机器,同样也不可能充分发展。

但是,人们不能不顾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发展应该保持的比例,而过多过快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因为那样就会使消费资料的生产,由于缺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不能相应地增长,甚至低落下

① 见李富春:“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和国家统计局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的公报。



来，那就会使群众的消费水平降低。由于第一部类生产增长而增发的工资基金，就会在市场上买不到消费品。这样，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即提高全体劳动群众福利的目的，就要受到损害，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的目的，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过分强调重工业对加快建设速度的意义，而忽略了适当发展轻工业对加快建设速度的意义，是一种片面性的错误。实际上，发展轻工业的生产，不仅能够迅速地积累资金，而且因为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对于加快建设速度是十分有利的。

当然，人们如果把人力、物力和财力过多地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就要缩小，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变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变慢。这与全国人民迅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归根结底，提高全体劳动群众福利的目的，同样要受到损害。

所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是互相制约着的，任何一个部类生产片面地、过多过快地发展，都会引起失调，引起比例的破坏，结果就引导事情走向自己的反面，多会变成少，快会变成慢。

问题是要找到发展两个部类生产的正确比例，以便不但能够保证既以高速度实现扩大再生产，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有不断的提高。这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所要解决的任务。在这里，

必须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自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一个死板的算式，因为很多比例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这些比例关系本身也随着生产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此外，人的觉悟水平也是一项重要的条件。群众的觉悟高，干劲大，增产指标就可以订得高些；在执行先进指标的过程中即使暂时出现了某些不平衡，只要群众鼓足干劲，也容易迅速达到新的平衡。但是，人们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却决不能因此而低估它的决定意义。如果以为人们自己可以想到哪里就做到那里，根本否认规律的客观性质，那就会变成唯心主义的俘虏。总之，我们必须正确运用这个规律，才能够真正迅速地前进。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是對抗性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建立在对劳动群众残酷剥削的基础上面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例，是由市场的自发过程来调节的，它们根本不可能实现有计划的发展，所以，那里经常出现各种不平衡、震荡和危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才可能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能够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基础。

在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上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可以把我国五亿多农民伟大的力量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并且可以随着建设的发展不断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就可以真正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反之,用一条腿走路,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用一条腿走路的方針,是一条少慢差費的方針。

总之,为了发展工业,必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同时发展农业;这里,发展农业就变成了发展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須同时适当地发展輕工业;这里,发展輕工业也就变成了发展重工业。毛澤东同志在論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时候,曾論述这种辯証的发展关系說:“农业和輕

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这里,慢就变成了快。总之“相反”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相成”的东西,对立面就是这样变成了同一的。也就是說,对立面就是这样地完成了向自己相反方面的轉化。

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包含着对立面互相渗透的关系,包含着“亦此亦彼”的关系,包含着对立面的統一。它和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公式是不能相容的。

三 对其他几个“并举”的簡略分析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說的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針中,其余的几条方針是,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工业方面集中領導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結合的方針以及以鋼为綱、全面跃进的方針。提出这些方針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調动一切积极因素,調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发展工业的积极性。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第二次會議的报告中說,“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須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針,彻底打破那种認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級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实行分工合作,‘众人拾

柴火焰高’,事情才能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我們要真正实现这里所說的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針,在发展工业中貫徹党的群众路綫,要調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动員他們积极支持工业化的事业,直到自己动手大办工业,只依靠中央工业、大型企业、洋法生产这一条腿,是不够的,甚至是达不到目的的。必須依靠另外一条腿,即地方工业、中小型企业 and 土法生产等等。

我国广大群众发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是人們主觀願望的产物。整风反右以后,广大群众在党的号召下,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山区,到处风起云涌地办起工业来了。群众举办的大量的小型企业,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掀起的全民大办鋼鉄的热



潮，不仅对于去年鋼产量翻一番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在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彻底打破了，群众路綫得到极大的胜利。

列宁早在一九二一年論述农村小型电站对于提高农民觉悟的作用时說：“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形成了新的現代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它們究竟向农民說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簡陋的木犁，而会向另一个时代迈进。”“农民群众的觉悟正在提高，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①列宁的这些話，不但适用于我国的数目正在迅速增加的农村小型电站，而且适用于我国农村中多如滿天星斗的小型工厂、小高爐、小炼鋼爐等等。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既充分发挥中央工业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地方工业的积极性的問題。这里应该研究中央的重点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关系問題；“全国一盘棋”和在这个原則指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問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比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在各协作区和許多省区范围内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的問題等。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之后，在研究地方工业問題时，应该充分重視人民公社举办各种工业的意义。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縮小城市和乡村

的差別。公社工业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它同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中間，也存在着对立面統一的关系。它們分属于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但又都属于統一的社会主义經济体系。它們的根本目的是是一致的，但具体任务是有区别的。党的決議中規定公社工业必須同农业生产密切結合的方針，也規定了它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場服务。很显然，国家的大工业对于公社工业未来的发展，必将起着极重要的主导作用。

下面要談談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两条方針合在一起來討論。一般地說，大型企业和洋法生产是相联系的，小型企业多数是和土法生产相联系的。中型企业一部分是和洋法生产相联系的，另一部分却是和土法生产相联系的。

不要“小、土、群”，是錯誤的；但是，如果認為只要依靠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就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同样是錯誤的。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即这两条腿之間的互相依賴、互相促进的关系，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必須大中小并举，洋土并举，才能有利于迅速地滿足經济建設事业和人

^① 見“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



民生活的不同需要。用洋法生产的大型企业，好似人的骨骼，树的主干，担负着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凡对产品要求技术精、质量高，并且需要大量供应的，主要就应该由采用洋法生产的大型企业来担任。中小型企业与土法生产，好似树的枝叶，它也可以起极重要的辅助作用。它的每个企业的产量不高，但集腋可以成裘，集少可以成多，数量变化可以引起质量变化。它的规模小，设备简单，技术水平不高，但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也可以出产质量不错的大产品。而且，从满足需要方面说，很多种需要并不都要求有很高的质量。例如，建筑普通住宅、制造小型机械、普通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具的钢铁，尽可以由中小型企业或用土法来生产。中小型企业的产品满足了这些需要，就可以使大型企业的负担大为减轻，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的任务。在满足需要、特别是满足消费品的需要方面，大企业固然可以满足人们某些主要的需要，但是在规格、品种、花色上，其满足需要的“本领”，有时候就未必能比中小型企业来得大；因为，大企业产品的品种终究有限，而中小企业的产品却可以多种多样，并且容易灵活变换。一般说来，土法生产的产品质量低，但也有很多土法生产的产品同洋法生产的产品在满足需要上是没有区别的。此外，还有某些产品（特别是某些精细产品），用手工生产或土法生产，质量甚至还比洋法生产的更好。

（2）在发展生产的经济原则方面，一般说来，采用洋法生产的大企业固然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合乎经济原则，但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把其他条件联系起来看，问题就不如此简单了。洋法生产的大企业需要的投资大，设备不易解决，技术不易掌握，投资效果发挥慢，不能多建快建，如果只用这一条腿走路，就会“远水不救近火”，延缓了建设的速度。中小型企业与土法生产，需要的投资少，设备容易解决，技术容易掌握，投资收效快，可以多建快建，“立竿见影”。自然，“大”、“洋”的企业可以节省劳动力、原料和资源，“小”、“土”企业要多用些劳动力、原料和资源。但是，一方面，这种情况会随着技术提高而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也要把其他条件联系起来考察。譬如，在人口众多、技术落后的我国，为了加快速度而多出点劳动力，问题并不严重，而且还会有利于训练技术力量。此外，这样作还会成为促进改良工具、改进技术的推动力量。至于多耗费原料和资源的问题，情况也相类似；因为，即使目前耗费稍多，但是在建设速度上得到了补偿，未尝不是一件更经济的事情。所以，有些在经济发达、人口不多的国家看来是“不经济”的事情，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我国，却变成了“经济”的事情；相反，有些在他们那里看来是“经济”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变成了“不经济”的事情。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在将来，我们无疑地要兴建更多更



多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目前，特別在广大农村中，我們还要大量举办小型企业。将来，一定有许多中小企业会变成大型企业，但是仍然要保持很多的小型企业。因为，不論条件如何，小型企业总有許多應該保存的理由。例如，中小型企业比大型企业更适宜充分利用分散的、少量的資源，并且由于接近原料和市場而节省运输力量。大型企业由于技术复杂，它的重要产品常常由大量的部件、零件組成，这些部件、零件由中小型企业协作制造，就免得大厂添設許多附屬的生产单位。有些中小型企业，是利用大型企业的废品、次料进行生产的，可以使得“物尽其用”。所有这些，都是大大有利于發揮潜力和节省資金的。另外，在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中，凡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相同或基本相同，而土法生产更为經濟节省的，当然以采用土法生产更为有利。

(3) 从有利于提高生产技术方面看，大中小并举，洋土并举也是有益无害的。大型企业的技术水平高，有利于向专业化和“尖端”发展，并且可以給中小型企业以許多帮助，有利于提高它們的技术水平。中小型企业技术水平較低，但是它們除了可以和大企业协作，代大企业制造部件、零件之外，还可以把許多修配任务和小量定貨之类的任务担負起来，这就大大有利于大企业集中力量向专业化方面或提高方面发展。所以，認為在技术方面只是大企业能够帮助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能帮助大

企业的观点，显然是錯誤的。另外，洋法生产一般說来是先进的，但任何技术都不会停滯不前，因此也还是需要不断的改进。土法生产虽然一般說来比較简单，比較低級，但是，它是广大群众长时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它不仅因地制宜的特长，而且其中也蘊藏着无数真理的顆粒，它也有許多胜过洋法生产之处，有的現在虽然比較落后，但經過提高，是可以变成先进的。“重洋輕土”，認為研究土法生产对洋法生产无所帮助的观点，显然也是錯誤的。

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的界限，从发展观点看，只是相对的。今日之洋，会轉变为明日之土；今日之土，一部分虽然被淘汰，而另一部分却可能变成明日之洋。复杂的技术和简单的技术并存，外来技术和本地技术互相补充，这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中都是存在着的。指望世界上只有复杂的技术，沒有简单的技术，这不过是无益的幻想。否認土法生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起重要的积极作用，或者不去帮助它提高，甚至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显然是錯誤的。

(4) 从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前途看，大中小并举和洋土并举，既然有利于群众大办工业，就可以为我国工业化事业培养大批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大大有利于提高工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并且大大有利于縮小以至消灭城乡的界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这些，对我国



的社会发展和准备向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过渡，是具有极大利益的。

由此可见，大中小并举和洋土并举，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所要求的，“重大輕小”，“重洋輕土”的片面性观点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极少数人認為“愈小愈好”、“愈土愈好”的片面性观点，当然也是錯誤的。

这里附帶說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互相依賴、互相促进的关系，和資本主义社会中大魚吃小魚、大企业压迫和吞并小企业的情况，形成了鮮明的对比。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小企业只有拼死掙扎才能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中也

有互相矛盾的一面，例如在資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分配等方面，是有着一定矛盾的，但是，它們既然都是社会主义經濟內部的不同部分，它們是建立在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小型企业的长期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

最后，工业里集中領導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結合的方針所要解决的，是属于发展生产工作中領導与群众之間的关系問題。以鋼为綱和全面跃进的方針，是为了正确处理鋼鉄生产和其他生产的矛盾关系或比例关系。这里两条腿之間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統一的。

四 几点簡略的概括

从以上对于用两条腿走路这一整套方針的簡略分析，可以看到：

第一，党所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建立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客觀規律正确認識的基础上面的。这些方針所要解决的，既包括了物与物之間的关系，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这些不同方面的关系，按照自己的規律运动着，它們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人們可以利用自己对这些客觀規律的正确認識来为社会謀福利，但是，如果認為这些方針所依据的客觀規律，是人們任意制造出来的，可以隨便加以改变的，那么，就会走上唯心主义的錯誤立場上去。

第二，矛盾的两个側面，是按照辯証法的規律运动的。它們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賴、互相促进。它們还可以因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轉化。用形而上学方法看問題的人，看不到对立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賴、互相促进的辯証关系，更不懂得对立面因一定条件向相反方面的轉化，所以总是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針，企图主观地扶植一条腿发展，而片面地压制另一条腿的发展。他們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事物間互相对立的现象一举而加以消除。但是，由于他們既不尊重唯物論，又不尊重辯証法，所以总是“剪不断，理还乱”，越是想用簡單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就越陷于被动，



最后还是要承認有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必要性。

第三，“两条腿”不是不分主次的。矛盾着的两个側面在一定条件下，必有一面居主要地位。例如，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重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鋼为綱和全面跃进的关系中，以鋼为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其他几条方針中，中央工业、大型企业、洋法生产和集中領導，都是矛盾的两个側面中的主要方面，因为这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客观进程所要求的，或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发展过程所要求的。不承認这种主次关系固然是錯誤的，但是，把这种主次关系，看得太絕對了，例如把主要的一面強調得太过分了，也要犯錯誤。这种主次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內，也可以出現相反的情况。例如，建立洋法生产的大型企业，是我們发展的方向，但是，在資金和技术条件不具备时，发展土法生产的小型企业反而成为一时一地的主要努力目标。还有，用两条腿走路，必須反对两种片面性，防止在克服单用这一条腿走路的錯誤的时候，又会犯单用另一条腿走路的錯誤。“左”的片面性或右的片面性都是應該防止的。

第四，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只是为了提供人們一个解决經济发展中的矛盾問題的基本方向，并不是为了給人們一个死板的“公式”。人們要正确运用它，就必须自

己动手作具体的分析工作。首先，什么是自己工作中主要的“两条腿”呢？“两条腿”如何“同时并举”呢？它們應該按什么比例发展？它們的互相排斥的一面是如何表現的？它們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轉化？它們互相依賴、互相促进的一面是如何表現的？怎样才能使这种互相協調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更加发展？……所有这些問題，都是沒有現成的答案的，必須用認真的調查研究和具体分析来解决它。采取簡單化的办法，把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当成可以随便乱套的公式，并不作任何仔細的分析，这样当然不会得到什么有益的结果。同时，事物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在大跃进的局势下，这种变化发展更是十分迅速，已經形成的比例关系、協調关系和平衡关系，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或遭到破坏，需要随时加以調整，甚至重作安排。人們如果不願意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及时調整事物两条腿之間的关系，当然会发生錯誤。这就是用孤立、靜止的观点来看問題，也就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現。

最后，可以从前面的分析中看到，在国民經济中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具有的无限优越性的表現。正确处理国民經济中的各种矛盾，辯証地解决它們既对立又統一的关系，就可以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一切积极因素調动起来，因而也就可以限制一切消极因素起作用的范围，大大有利于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



义社会的总路线的实现。在一切私有制的社会里，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里的矛盾和冲突，是极为尖锐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种日薄西山的社会制度，将被朝日初升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丢在后边。自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的区别，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运用还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人们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调节的范围，还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局限性，

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进，而得到更大程度的消除。人们除了受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限制，还可能由于缺少经验和主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执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发生错误，出现发展比例不当和失调现象。但是，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经过人们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自觉的努力，就会使客观过程中的辩证法更多地反映到自己头脑中来，错误就可以克服，人们就可以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

五 真理是通过实践而发现、发展的

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经验的，在实践中，经过一些曲折的前进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逐步反映到我们的主观认识中来。

在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等一系列的关系或矛盾问题。在这些矛盾问题面前，人们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有些人认为，我国农业既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大量的农业机器，因而不可能较快地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和技术改造。他们认为我国农业在长时期内没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看法，虽然和忽视农业的观点有区别，但是，它在实质上就是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听任农业落后。这个观点的

主要错误，就是只见物不见人，用机械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工农业发展问题，看不见中国的广大农民这一支极伟大的力量。

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不仅在解决我国革命路线的问题上，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问题上，同样作出了极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我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不久之后，就指出了必须既抓工业，又抓农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成为迅速完成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进军号角，从而也为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伟大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给农业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同时，毛澤东同志还指出了发展农业和輕工业对于积累工业化資金的重要性。这一正确方針既保证了我国工业建設的迅速进展，又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工业化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并举的原则，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的原则。在这个报告里，毛澤东同志对于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所遇到的重大問題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析，它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的思想方法，坚持了辯証唯物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思想方法。在这个报告里，我国的經濟建設必須贯彻党的群众路綫、必須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明确奠定了。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极重要的报告里，把上述方針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問題提了出来。他在这里作出了重工业将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場的創造性的論断。毛澤东同志提出的这样一些方針，是在研究苏联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建設的宝贵的經驗、研究我国的具体特点和总结我国六亿人民几年来經濟建設的經驗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原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被确定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們知道，我国一九五七年冬天和一九五八年春天所开始出現的工农业大跃进，正是在整风运动和反对資产階級右派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之下，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取得的。由于我国大跃进中人民排山倒海的伟大的实践，創造了极为丰富的經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发展得更加完备了。

一九五八年，我国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不只是在指导国民經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且在指导我国教育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九五八年，我国的教育工作，不仅贯彻了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对教育工作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造，而且在教育工作的发方面，提出了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

* 研究事物的关系，也就是研究事物間的矛盾。在論述到經濟关系时，恩格斯在“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中說：“既然这是一种关系，那末这个事实本身就表示其中包含有互相关連的两方面。其中每一方面，我們都从其自身来考察；由此就得出它們相互关連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同时在这里也就暴露出需要解决的矛盾。”（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



地方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出了統一性和多样性相結合、普及与提高相結合等一系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使得我国的教育工作的全部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內就为之煥然一新。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还在其他許多部門工作中被当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項重要原則，用来指导工作，帮助人們去克服片面性的缺点。

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論”里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証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認識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認識，又从理性認識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認識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較地进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几年来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的形成过程，就是这些話最有力的証明。

“实践論”还有一段話說：“无产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

界的关系。”中国人民既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客观世界辯証規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也必然能够使自己主观世界中的辯証法得到发展，我們應該总结經驗，我們應該学习，以便达到这个目的。



画 龙 (套色木刻)

朱 純 一



談洋土并举

曾 希 圣

安徽是一个工业基础比較落后的省份，鋼鐵生产基础尤为薄弱。生鉄产量在一九五七年只有二十万零九千七百五十九吨，鋼还是空白。但由于打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点，坚决执行了洋土并举的方针，不仅改变了鋼鐵工业发展速度不快的情况，而且由鋼鐵工业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生鉄产量为一百零七万三千吨（除本省自用外，大部分外調），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四倍多。其中土法生产的占百分之四十一·三，洋法生产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七。鋼产量十三万多吨，超过了解放前国民党統治地区（除东北外）鋼年产四万多吨的两倍多。在十三万多吨的鋼产量中，土法生产的占百分之七十三·七，洋法生产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六·三。虽然标准鋼的比重不大，但是大大地减少了安徽省广大农村中缺鋼的困难。其他如煤产量八百六十六万七千吨，其中土法生产的占百分之五·五；机床生产一万多台，除洋法生产的一千台外，其余全是土法生产的。虽然这些土机床只能做一些简单工具，但是及时地满足了农村运输、农业生产、水利排灌等方面制造和改良工具

的迫切需要。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用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两条腿走路，要在基础如此薄弱，时间如此短促的情况下，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年来大跃进的各项指标，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尽管洋土并举的方针，在我国大跃进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还有一些人不赞成或者怀疑这个方针。他們认为：土法生产是手工操作，技术低，产品的质量差，成本高，得不偿失，不合算。他們根据这些理由而把土法生产一笔抹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們不了解我們所主张的土法上马，是在缺乏洋法生产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洋法生产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辅助办法，是由土生洋、以土换洋的生产步骤，它是我国当前发展生产建设、促进工业全面跃进的一项重要方法。土法生产一般具有投资少、建设快的优点，有些土法生产的产品质量也是好的。土法生产已被实践证明符合于我国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在经济上是合算的。拿土法和洋法两者的投资来作比较，采煤为三比二十，炼鉄为一比二十。很明显，要考虑合算不合算，首先就应当算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大



眼。至于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更不用说了，它能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能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能鼓起敢想敢做的干劲，能锻炼出意志坚强的干部，能培养出有实际经验的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人才。試問，这种情况能够說是得不偿失、不合算嗎？

当然，土法生产也是有弱点的。由于今天的土法生产一般是用手工操作，因而花费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多，成本比较高，質量比較差。譬如：土法炼鉄，在安徽來說，除大别山区的生鉄合乎规格外，其他地区的土鉄質量就差一些，小土高爐比小洋高爐所花的劳动力要多两倍到四倍左右，煤的消耗要多一倍到两倍左右。土法开采的小窑煤比現代化方法开采的大窑煤所花的劳动力要多三倍到四倍左右。土法制造的机床，其精密度不如現代化机器厂制造的机床。土法生产在这些方面不如洋法生产的弱点，是不可忽視的。

尽管事实証明土法生产存在着弱点，但在安徽省也还有人只满足于土法生产，而不想尽办法，战胜一切困难，在搞土法生产的同时，去搞洋法生产。他們不管在什么地区、什么工种，都想大搞土法生产。他們認為只有搞土法生产，才能广泛发动群众，才能人人插手办工业，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或者認為洋法生产在設備上有困难，不能操之过急。这种看法虽然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不能認為

是全面的。必須了解，土法生产能搞群众运动，洋法生产也能搞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全面大跃进中，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不足是普遍現象，因此，越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越能降低劳动强度，越能减少劳动力的支付，越能发挥原材料的效用，越能节省原材料的开支，就越能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要求。如果只看到土法生产的长处，而看不到土法生产的弱点，不作具体分析，不权衡利弊，不分地区、不分工种，一律大搞土法生产，即使达到了多快，也很难达到好省。我們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不能抓了这一面而丢掉那一面，否則就是片面性，不是真正的两条腿走路。至于搞洋法生产，在設備上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克服右傾思想，依靠群众，发挥一切潜力，在一定地区、一定条件下，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一九五八年九月，我們曾计划在三个多月內，建立八立方公尺以上的小洋高爐八百多个。当时，有很多人認為在安徽机械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但結果，我們终于完成了小洋高爐的建設。現在看来，这种作法是对的。

否定土法生产或者只满足于土法生产而不积极搞洋法生产，从思想方法上來說，都是片面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告訴我們，由土到洋，不断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一切上的必然向洋的方向发展，一切洋的都是从土的基础上成长的。



譬如，石器时代必然向銅器时代发展，而銅器是从石器基础上成长的；銅器时代必然向鉄器时代发展，而鉄器是从銅器基础上成长的；蒸汽时代必然向电气时代发展，而电气是在蒸汽基础上成长的；电气时代必然向原子时代发展，而原子动力是从电气基础上发展的。而且，土的与洋的是相对的，是互相轉化的。譬如从石器时代进到銅器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鋒利的銅器比之粗笨的石器，的确可称为洋的，但在进入鉄器时代以后，銅器又只能称作土的了；同样，电气比之蒸汽是洋的东西，但同原子动力比起来又可能成为土的了。所以土的是永远会存在的。总之，宇宙是一个多样化的宇宙，事物的发展永远是不平衡的，我們絕不能以简单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問題。必須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辯証法，既不能否定土法生产，也不能滿足于土法生产。要大搞技术革命，大搞技术改革，把土的轉化为洋的，把洋的再加以提高。不仅要用两条腿走路，而且要用两条健壮的腿走路。因为不

如此，就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效地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

洋土并举、用两条腿走路，是生产方法上貫徹多快好省的基本原則。这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原則，是值得商討的。从我們局部的短时期的实践来观察这个問題，我們認為：

第一，对土法生产的特点和搞土法生产的各种条件，同样要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認為搞土法生产可以不講条件，不管任何地区、任何工程，都可大搞土法生产，可以讓群众自发地搞土法生产。由于土法生产比較分散，人多面广，必須加强领导，不如此就容易形成一种“大呼隆”的做法，就很难保証“好省”的要求。去年安徽有一部分土鉄不合規格，并不是土法不能生产好鉄，而主要是领导沒有抓紧，有了問題沒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的結果。由于現在的土法生产还是手工操作，必須考虑工地和原料等条件是否合乎它的要求。如开煤

北京鋼厂巡礼(速写)
邵宇



这里有規模很大的冶炼車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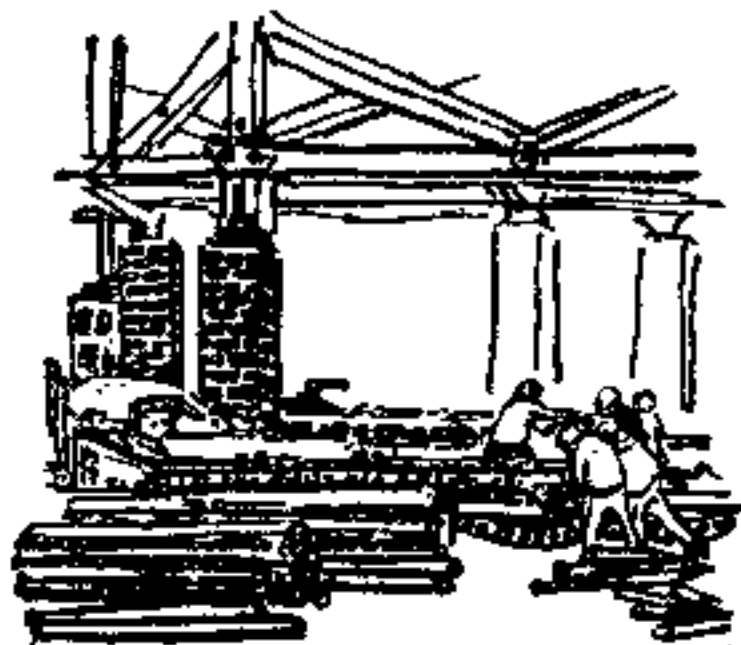
也有小高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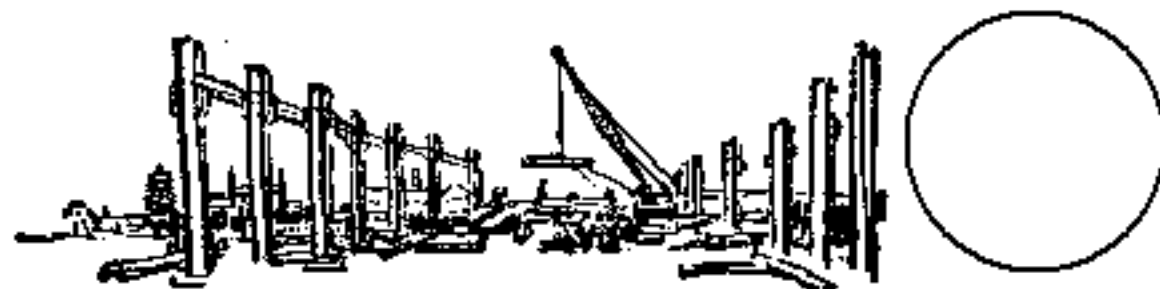
矿，在煤层深、地下水大的地方，就不宜搞土法生产；如炼铁，在沒有較好燃料和較好矿石的地方，就不宜搞土法生产；如炼铜，在矿石品位低的地方，也不宜搞土法生产。我們去年对这些問題，有的一开始就注意了，有的在实践中才看出問題，因而走了一点弯路。如开小窑煤，有的在二、三十公尺深的地方，也采取露天开采，結果形成返工。也有一些用劳动力过多的，就要考虑是否影响农业生产，是否符合供产销原則，都是需要精打細算妥为安排的。总之，土法生产常常被人們看为是容易的事情，因而放松领导，这是必須注意的。

第二，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方，必須努力搞小型洋法生产。土法生产也要迅速轉变为小型洋法生产。小型洋法生产，不仅更能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更能够迫使人們鑽研技术，更能迫使机械“元帅”升帐。可是在我們的干部中，常常存在两种不正常的心理。一是認為努力搞小型洋法生产，就不是两条腿走路。

这种錯覺是容易講清楚的，因为要搞小型洋法生产，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土法生产；而且小型洋法生产也是同大中型洋法生产相配合的另一条腿，而且可能是比較健壯的一条腿。另一种心理，总認為搞小型洋法生产困难多，有畏难情緒。这是需要批判的，而更重要的是要用典型示范來說服他們。根据一九五八年冬我們搞小洋高爐的經驗，小型洋法生产所要求我們的条件并不那么高，也并不是要求样样俱全。一般說只要具有解决动力的条件和一定的机械力量，就可以下决心搞。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不能粗枝大叶，但也不要过分地謹小慎微。应当承認搞小型洋法生产是有困难的，但也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在一九五八年冬搞小洋高爐的斗争中，我們所感覺到的困难，首先是技术干部不够。当时我們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抽調工农出身的学生和农村的铁业学徒，派出“留学”；同时需要把任务交給各个单位（如政法单位、財貿单位、农业单位），而不抽調他們的干部。一方面帮助他們，一方面



在建設得又快又省的厂房里
生产出現代化的无縫鋼管



鋼厂在扩建成长中



由他們主動地去搞，這就發揮了他們的積極性，挖出了干部的潛在力量。這樣，缺乏領導干部和技術干部的困難，很快地就得到了解決。其次是材料設備的困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除集中力量和材料解決那些不能代替的一些主件（如鼓風機）外，其他次要部件，主要是採取土法洋化、洋法土化（亦即簡化）的辦法，就地取材，多用代用品，然後再逐步改進，逐步提高。譬如，缺乏水泥鋼筋打爐基，就以青石來代替；缺少做爐腹、爐缸的鋼板，就用白鐵皮加鐵箍來代替，或用炭素搗固，根本就不需要鋼板；沒有水泵、馬達和鋼管，就用改良木製水車和毛竹管來代替；缺乏卷揚機，就用木製手搖升降機來代替；缺乏鑄鐵管，就用陶瓷管來代替。由於採取了這些土的簡易的辦法，因而原料和設備的困難就很快地得到了解決，而且效用也不比洋的差得多，所以就很快地把大批小洋高爐建成並投入了生產。這證明：只要鑽進去，把所謂小型洋法生產設備的每一部件加以分析研究，其中許多東西都是可以簡化，可以用土辦法代替的，許多材料是可以節省的。現在我們正在研究，把鼓風機改成吸風機，把吹冷風變成吸熱風。這樣做就可以節省大批管道。多餘的煤氣，不僅可以焙燒各種礦石，而且可以利用熱風室發電，帶動鼓風機和破碎機，還可以解決照明需要。這樣做，不僅在有電力的地方可以搞小洋高爐，而且在沒有電力的地方也可以搞小洋高爐。其他各種土法生產也是

一樣。如機械，去冬阜陽地區只注意搞土法生產，做了不少土機床，但製造能力不大，只能做些螺絲釘和農村用的滾珠軸承。後來着重解決機床中的螺絲杆、齒輪和含油軸承三大主件，其餘的則多用土的，從而迅速轉化成小型洋法生產，因而水泵和馬達之類的東西也就可以自己製造了。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看法，即一切土法生產，只要有可能，就不僅應該而且可以迅速地改變成小型洋法生產。

總結起來說，為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按照國家的統一計劃，實行大中小結合、洋土並舉的方針。既不能否定土的，也不能過分夸大土的。土法生產，有條件的又必須向洋的方向逐步提高，而不要滿足于土的。所謂洋法生產，也是有不同水平的，並不都是正規化的，有些可以是以洋為主、以土為輔的，也就是說要把洋土結合起來。如我們的小洋高爐，在開始，許多東西是用代用品搞起來的，這難道不是土的嗎？但許多重要部分又真正是洋的。因此，對所謂洋土並舉的理解，不應該單純地認為是在一個地方搞土的，在另一個地方搞洋的，而應該看成是在一個小高爐中，在一個工地上，在一個礦井內，在一部機床里，把洋土結合起來。這種洋土並舉，才是全面的洋土並舉，才能更好地達到多快好省的要求。



在工厂中开展群众运动的几个问题

石西民 蓝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照耀下，一九五八年上海的工业战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点三（不包括郊区十一个县的工业产值），一年内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和新品种达一万二千多种。这些巨大的成就，标志着党的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胜利。目前，上海工业战线面临着新的更为重大而艰巨的战斗任务。认真地把去年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坚持下去，使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中牢牢生根，使所有干部更明确地树立起依靠群众办工业的思想，这是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一项重要保证。

这里，我们就上海一部分工厂在去年广泛发动群众中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不断改进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们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分工，并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由于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加上一部分干部的身上还残存着旧社会思想作风的影响，因此，企业干部与工人群众虽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这就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过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分析完全符合于工厂企业的情况。

企业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企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建立了领导与群众之间互助合作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领导



与群众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及时地适当地解决，就势必妨碍生产的发展。不断改进领导与群众之間的关系，更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以适应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这是党领导企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年来，上海工厂企业正是由于逐步地掌握了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思想武器，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不断地调整与改进了领导与群众之間的关系，才在企业内部真正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生产大跃进的主要动力，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經驗。

不断地改善企业领导与工人群众之間的关系的問題，比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解决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与群众之間的矛盾。这就是要求所有干部彻底打掉三风五气，經常打扫在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这些旧社会的灰尘，真正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群众平等相待，心心相連，同甘共苦。对于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思想和狭隘观点，也应该以誠恳的态度和极大的耐心，反复进行說服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群众逐步懂得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不应该簡單急躁和采取任何粗暴压服的做法。另一方面，又要解决一部分干部的保守思想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創造性之間的矛盾。这就要求所有干部在进行任何工作中，都必须牢固地树立起依靠群众的观点，养成遇事和群众商量

的作风，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真正善于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发挥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的潜力。

为了解决上述两方面的問題，从去年上海市一些工厂的情况看来，在繼續发揚整风精神的基础上，需要特別重視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与全国各地的經驗一样，要坚持全体干部“脱鞋下田”、参加生产劳动，并使之成为經常的制度。干部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使领导与群众之間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克服干部的三风五气，以及



照相师：厂长同志，锦旗应当給学徒拿，你和老师傅坐在一起。

厂长：不，我也是学徒！

韦启美



对于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人们反映说：“干部一下车间劳动，大跃进就来了。”同时，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也是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学习生产知识和提高领导水平的有效方法。现在不少工厂的领导干部把参加劳动与种“试验田”相结合，或集中一个时期轮流下去当工人，有些厂组织了一套人马，包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分三班跟班劳动，做到了在群众中领导群众、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因而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得到显著的改进，并且推动了一部分科室知识分子思想作风的改造。实践证明，要办好工业，只有把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同广大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干部参加劳动，正是这种结合的最好形式，也是不断改进领导与群众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其次，要向群众进行生产“交底”，经常向广大群众“讲形势、讲困难、讲办法”，使每个职工清楚地认识到完成国家任务和本厂任务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也认识到实现本车间、本厂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坚决纠正那种“只讲小局、不讲大局，只谈数字、不谈政治”的庸俗作风。这样，群众的眼光看得大了，方向明确了，心中有了底，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大跃进中的无数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以为困难是问题，一提交群众讨论，就有了出乎意料的办法。有的工人说：“过去我们不知道全厂整个生产

任务和要求，不知道自己应该多做些什么，有力也无处使。”也有的工人批评一些缺乏群众观点的干部说：“你们坐在房子里愁眉苦脸，就是不肯把困难交给我们大家，和我们来共同解决，这是活该受罪。”因此，只要干部真正进行生产“交底”，就能在广大群众中找到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干部和群众在生产上才能真正实现心连心，共困难，共欢乐。

再次，要有领导地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来充分揭露企业内部相互关系上、企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及时解决这些矛盾，进一步活跃企业内部的民主生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不仅可以起到监督干部、教育群众的作用，而且可以更好地把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调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应该看作是长期的任务。去年以来，上海工厂企业中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对这方面的注意。最近上海有个工人同志贴了这样一张大字报：“整风运动是结束了，整风的精神永远不能丢掉。”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正是对我们每个干部很好的鞭策。任何干部如果离开了群众经常的监督，不时刻警惕自己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原来先进的也有可能转化为落后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也要求企业干部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领导水



平，才能真正把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处 理得好。

正确解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基本上是符合于生产发展需要的，它对于生产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某些企业管理的环节上，也还存在着落后于生产发展或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状况，及时地调整 and 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又是推动企业生产发展和充分发动群众的必要条件。

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集中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高度的集中必须以高度的民主作为基础，企业管理离开了自下而上的高度民主的基础，必然会严重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可能在企业中建立起真正有效率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集中管理。高度的民主又必须要求高度集中的指导，愈民主，愈要有集中；愈发动群众，愈要求加强领导；群众运动的规模愈大，内容愈丰富，愈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并且使企业的各项工作紧紧地跟上去。这样，使企业的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效率，保证群众生产运动持久地巩固地向前发展。

整风以前，在我们企业中有一些人，往往片面地强调集中管理，忽视了企业的集中管理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

面，因此，他们片面地认为科室愈多愈好，分工愈细愈好，管理制度愈烦琐愈科学，并且以此作为“管理水平高”、“管理基础强”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就在某些企业中形成了科室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的缺点，制定了某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一年来，随着整风运动和群众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冲破了这些方面的束缚，改革了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发展与群众需要的、不合理的、或过时的管理制度与陈规旧章，精简了科室管理机构，并且吸引了广大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企业管理的民主基础进一步扩大了，从而大大有利于搞好生产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企业的集中领导。

广泛地吸引群众直接参加企业日常管理工作，是去年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经验，这是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的新发展。一年来上海企业中群众直接参加管理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大和提高的，从参加生产小组的日常记工、考勤、领料等方面，最后发展到参加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凡是做得好的单位，不仅扩大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基础，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也使企业管



理工作更加切合实际，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效率。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經有过一些人怀疑工人的管理能力，怀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生产，事实証明了他們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上海有綫电厂在工人参加管理后，对三个車間四十一个生产小組进行調查的結果是：下放职权后，人人尽責、管得井井有条的有十八个小組，基本上管起来的有十六个小組，两项合計占小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弱，管得較差的仅有七个小組，但是也比过去那种单纯由科室干部去管的情况要好些。一些原来心存怀疑的人，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認工人不但能够管而且管得好，他們說：“現在是人多、眼多、嘴多、手多、腿多，事情更好办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最基层組織是生产小組，工厂中的生产活动，都要通过小組来进行。許多工厂的經驗証明：如果一个工厂里出現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小組，整个企业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大加强小組的工作，发动工人参加小組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和定期召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結合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在企业管理工作中貫徹执行群众路綫，不断改善企业管理工作。有一些工厂在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后，沒有認真加强对小組的帮助，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或者是沒有把工人参加小組管理工作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結合起来运用这都是不好的。

为了更好地吸引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需要繼續改革那些不合理的、束縛生产力发展的規章制度，制定新的有利于發揮群众主动性和創造精神的規章制度。去年以来，不少企业里进行了規章制度的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发展与發揮群众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整风以前，在一部分企业里有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严重地束縛了群众的积极性，例如郝建秀工作法，本来是紡織工人自己的創造，可是一經頒布推行，就有人認為再不能根据群众的經驗来修改提高。有些工艺圖紙在生产实践中已經証明行不通，有錯誤，但是仍然照旧使用，不准改变。工人做出了合格的成品，却因为不合那些脫离实际的圖紙，就認為是“不合制度”，要当作废品处理。也有些規章制度，是在不信任工人群众的思想基础之上建立的，把互相監督、互相制約，強調到了步步設防、层层設卡的程度，使工人的主动性得不到發揮。象这类規章制度，必須坚决地加以改革或者废除。但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决不是废除企业中一切規章制度，也不是在破除不合理的、过时了的規章制度的时候，不建立起新的必要的規章制度。在現代化企业中，必須有各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規章制度，沒有这样的規章制度，就必然使生产出現无人負責的混乱現象，破坏生产的进行。去年在改革規章制度中，也有少數的情况是改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例如不該改的改了，或者只改了旧的制度，沒有建立新的制度，



对这类情况應該設法及时加以改正或者补救。今后对于不合理的、过时的規章制度，仍然需要繼續进行改革，但應該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屬於技术性的，以及为保証質量、保証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規章制度。在改革的时候，一定要經過审慎研究和实践檢驗；有些关系重大的，还應該經過一定領導机关的审查和批准，不能随便变动。凡是沒有正式决定取消或者改变的制度，都應該繼續坚决执行。不論是修訂、建立或者貫徹执行規章制度，都必須采取領導和群众相結合的办法，因为企业中任何規章制度，只有真正为群众所掌握，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来实施，才能起到組織生产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

繼續精簡党委机关和行政部門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的組織机构，也是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整风以来，許多工厂的管理机构有了适应于生产需要的变化，其中特別显著的是大批脫产干部回到了生产崗位，臃肿的管理机构有了較大的裁减，一些煩瑣的不必要的統計表报精簡了，这是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今后还应当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繼續这样做。

对于以上这些有关企业管理工作的改

革，任何干部都不應該有錯誤的、片面的理解。上海曾經有过个别单位片面地理解了民主化的意义。在他們看来，既然在企业管理工作中要扩大民主，索性集中就不要了；既然要发动群众，索性领导也可以取消了；既然要工人参加管理，索性科室也不要了；既然要改革規章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索性規章制度也不必要了。他們認為不要集中、不要领导、不要分工、不要制度，才叫做群众路綫，才叫做平等关系。这不是群众路綫，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想。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經出現，就被市委发觉和制止了。市委及时指出了，社会主义企业吸引群众参加管理与加强企业的集中领导是一致的，正是为了更有力地实现企业的集中领导；决不能把改善企业内部领导与群众之間的关系，誤解为可以取消企业内部必要的分工。所謂平等关系，是指企业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在政治上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企业內的集中领导与社会分工，則是組織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不要集中领导，不要正确的分工，不要严格的責任制，就必然引起生产上的混乱，妨害生产。及早地澄清某些干部中的这类胡塗思想，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改进企业管理工作，是有极大好处的。

大鬧技術革新、技術革命

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方面的矛盾，把群众的积极因素充分調动起来的根本目

的，是不断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海企业中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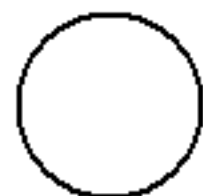


生产运动发展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以大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作为中心内容。当领导与群众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管理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改进，就为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和充分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但是，群众的冲天干劲离开了巧干是不能持久下去的，要高速度完成生产指标也是不可能的。要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巩固，就必然要提出革新技术的要求。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是逐步地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开始从操作、工艺上的改进，进而转入到在设备上、原材料、以及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因此，抓紧以大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作为中心，是符合企业中群众生产运动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是解决先进与落后之间矛盾的斗争，技术革命究竟是大闹还是小闹、是大多数人闹还是少数人闹、是轰轰烈烈地闹还是冷冷清清地闹，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领导干部中克服了对技术的迷信，正确地反映了群众愿望之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展开了。一年来的事实证明：群众性的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党愈强调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风格，也就愈是为运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条件。在工人群众中要不断打破认为科学技术“高不可攀”，以及形形色色的自卑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要

改变脱离实际和迷信书本的片面观点，在领导干部中，也要克服各种保守思想和迷信思想，热情地支持群众中大胆革新、大胆创造的革命精神。但同时也要了解，破除迷信必须与维护真理相结合，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必须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又必须与一切经过试验相结合。而且，只有在认真学习技术、掌握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大胆的改革。在这方面存在片面性，同样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运动的发展。

大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一定要贯彻“三结合”的原则。在党的领导下，使企业中的行政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三方面的作用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贯彻三结合的基础，仍然在于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离开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有三结合的。因此，必须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作中认真地走群众路线。技术人员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于各种生产技术的解决，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愈是复杂的技术问题，愈是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过去几年来，特别是在大跃进中，很多技术人员对于生产作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不少人在政治上有了进步，他们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也在逐渐改变。我们在企业中必须继续重视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忽视他们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特别是老工人，多年来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生产知识



也是十分可貴的，他們在生產中提出了許多合理化建議，其中有些是那些只有書本知識的人想不到的。那種認為生產技術問題只能依靠少數專家的想法也是不對的。這一年來的無數事實證明了，要搞好企業的生產技術工作，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把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團結起來，全面發動起來，才能真正形成堅強的技术領導，推動企業生產和技術水平的飛躍進步。去年上海的經驗又證明：實現三結合的最好方法，是採取在黨的領導下，發動技術人員和工人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辯論方法來共同研究和解決技術上的重要問題。上海柴油機廠在進行柴油機的一項重要部件柴油泵的改革中，通過發動工人、技術人員進行辯論，工人提出了十六條改革意見，通過辯論，相互補充，統一了認識，一致同意了十五條。技術人員堅持不能改的一條，經過試驗，證明他

們不能改的意見是正確的。這是個好經驗。

群眾性的技術革命運動要進行得好，企業領導就必須十分重視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科學、技術知識，使那些具有實際生產經驗的工人，進一步掌握理論知識。工廠企業的文化革命一定要配合生產更大地發展起來。

在大鬧技術革命運動中，發揚社會主義大協作的新的風氣，通過群眾性的互助支援，來解決生產、技術上所碰到的難題是極為重要的。去年一年來，上海不少工廠發展了這方面的協作關係，不僅在本廠內部，而且在廠與廠、行業與行業，以及發展到工與商、工廠與學校、生產部門與科學研究機構之間，相互在技術上進行了無私的支援，成為推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對於促進技術發展的優越性。

加強黨的統一領導

在工業生產中貫徹集中領導和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根本關鍵在於進一步加強黨對企業工作的全面領導，正確執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可能在企業中真正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出現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上海工人同志說過這樣一句話：“千條萬條，黨的領導是第一條。”這是生動地概括了黨在領導去年大躍進中所起的決定

作用。

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要加強政治領導，注意經濟工作中的政策性的問題以及幹部和群眾中的思想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保證黨的總路線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只有把這個方面抓緊了，才能真正發揮黨在企業中的領導作用。

從上海市一些企業的情況來看，加強



党对企业的統一領導与充分發揮各个組織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加强党的統一領導,是保証企业中各个組織正确地發揮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这一年来,在許多工厂中由于加强了党的領導,克服了分散主义的現象,批判了在某些同志中存在的“党不应该过問生产”、“过問生产就是包办代替”那一类錯誤認識,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們也应当健全厂长負責制,充分發揮企业行政的积极作用,消灭日常生产指揮中的无人負責状态。企业的各級行政領導人員应当采取領導和群衆相結合的办法加强各种生产責任制,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巩固劳动紀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証实现各項經濟指标。同时,在党的統一领导下,还必须注意更好地發揮企业中的工会、共青团的組織作用,协同行政完成生产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領導不致陷在煩瑣的大堆日常行政事务中,不致削弱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降低党的領導作用。

加强党的統一領導,应该更好地执行集体領導的原則,發揮全党的組織作用。在过去一个时期中,上海市的部分企业在討論企业内部党与行政工作的相互关系中,还曾經出現过所謂“誰說了算数”的爭論,这样的提法显然是錯誤的。因为,从組織原則上来講,企业中一切重大問題都应该由党的組織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集体討論作出決議,然后分工执行,决不是哪一个人講了就算数的。当然,在目

常的生产活动中,属于行政負責人和其他方面負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就应当責成他們切实負起責任来,才有利于生产的进行。从革命利益来講,只有真正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真正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想法和具体措施,才能真正算数;任何个人的意見,只要是錯誤的,都不能算数,都必须修改。如果不从党的原則出发,不把是非界限区别清楚,不分別問題的性質范围,一味爭論“誰說了算数”,是沒有意义的。

加强企业里党的統一領導作用,在目前特別显得重要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正在飞速发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正在蓬勃展开。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之下,工厂企业在搞好工业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十分重视解决工人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問題,为劳动人民知識化鋪平道路,担負起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任务。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工厂企业的党組織还必须十分重视改善职工集体的生活福利事业,妥善安排职工的劳动和休息,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群众干劲越大,党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在企业中做好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領導。

更正:本刊一九五九年第五期第九頁第十七行“一万五千万吨”,应为“一万五万吨”。



困难的兩重性

李 踐 为

战胜敌人，做好工作，处理矛盾，解决问题，完成任何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有困难，才需要人们去克服。干革命，就意味着不断地克服困难。所以，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会不会碰到困难，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困难。

毛泽东同志屡次告诉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在战术上重视一切困难。这就是我们正确地对待困难的基本原则。

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这是彻底革命派的英雄气概，是共产主义的伟大风格。共产主义者在考虑战略任务时，从来都是最敢想、敢说、敢做，敢于藐视一切困难的。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当资本主义统治着整个世界，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为数很少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勇敢地提出了从来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领导广大劳动群众，经过革命，经过夺取政权，来解放自己并解放全人类。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初期，虽然党员不多，力量很小，却敢于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以及在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我们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决不是单凭主观愿望，或出于盲目乐观，而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从根本性质上说，世界上的困难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先进阶级在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一种是没落阶级在向下没落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属于前一种的。这种困难，有时看起来虽然很严重，甚至似乎是不可被克服的，但终将被我们所克服。其原因就在于：先进阶级、新生力量，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前途的，是不可抗拒的；工人阶级的先进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最正义、最合理的，是完全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从战略上看，先进总要战胜落后，新生力量总要战胜腐朽力量，光明总要战胜黑暗。在我们面前，最凶恶的反动派，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终于要变成坦途。真所谓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得让路。

但是革命精神离不开求实精神，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性。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并不等于在战术上轻视一切困难。恰恰相反，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是和重视一切困难的战术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困难也有它的两重性。从全局看，从长远看，在我们面前，所有的困难必然终将被我们所克服，走向自己的反面。但从局部看，从暂时看，一切困难却又都是顽强地存在着，积极地表现着自己，拒绝走向自己的反面。堡垒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夺取，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今年一千八百万吨钢的任务，只能依靠千千万万的钢铁大军一吨一吨地去完成。一万零五亿斤粮食的指标，也必须由全体人民公社社员鼓足他们的冲天干劲来实现。不需要任何努力，只要“藐视”一番，就可以自然消失的困难，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没有的。所以，在战术上，对于任何一种困难，我



們都要承認它，正視它，重視它，都要認真地去揭露，去分析，去認識，并創造條件，千方百計地去克服它。

戰略和戰術的關係，是全局和局部的關係。局部隸屬於全局，并受全局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只有在全局上藐視一切困難，才能在局部上具有革命的預見性，充滿無限信心和勇氣，保持百折不撓持久不懈的鬥爭意志，敢于革命，敢于前進。反過來，只有在局部上認真地對待困難，一個個地去克服困難，不苟且，不猶豫，才能使全局上的藐視困難，不致落空。

既要藐視困難，又要重視困難，這是革命的辯證法，是工作的辯證法。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從來都是按照這個辯證法進行工作的。例如，當中國革命戰爭長期處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艱苦年代里，毛澤東同志曾明確指出：在戰略上，我們是以一當十，以寡敵眾，以少勝多；但在戰役戰術上，却始終堅持了以十當一，以眾敵寡，以多勝少的作戰原則。堅決不打無準備的仗，堅決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樣，便使戰略上的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不利形勢，在戰役戰術上變成敵弱我強，敵小我大的有利形勢，以便集小勝為大勝，集戰役戰術上的勝利為戰略上的勝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就是在這一辯證思想的指導下取得的。又如，我們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同樣是從既藐視困難，又重視困難的這一辯證觀點出發的。一方面，我們堅信一定能夠把我們這個又窮又白的國家建成為社會主義，不但能夠建成，而且可以多快好省；另一方面，要把我國建成為社會主義，就必須鼓足干劲，力

爭上游，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動員一切積極因素。這兩個方面的思想的對立統一，就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這一總路線的正確指導下，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藐視困難，重視困難，既需要“熱”，又需要“冷”。冷熱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可是有的人往往不願尊重這個冷與熱的辯證法，不肯按照這個辯證法辦事。他們只愛熱，不愛冷，或只愛冷，不愛熱。比如，有的人，只從主觀願望出發，把將來才可能辦到的事，硬要搬到今天來辦；有的人甚至竟要改變客觀規律，強迫客觀規律以自己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另外，有的人不敢排除萬難，奮勇前進，而是知難而退，被困難所吓倒。有的人喜歡指手劃腳，說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遇到一點困難，就愁眉苦臉，畏縮不前。這兩種人，雖然在對待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態度上有所不同，但他們的思想方法卻都是片面的。

一切困難都可以為我們所克服，又不是輕易地就可以為我們所克服，這是困難本身所固有的對立統一性。這一對立統一性，便規定了我們對待困難的辯證法：既要藐視困難，又要重視困難。俗話所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話正確地反映了這個辯證法。“天下無難事”，就是說，任何困難都難不倒我們，都不難克服；“只怕有心人”，就是說，人們必須下定決心，一心一意地去苦干、巧干，才能克服困難。前一句話是藐視困難，後一句話是重視困難。兩句話結合起來，就是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統一，敢想、敢說、敢做和实事求是的統一，冷和熱的統一；就是我們對待困難所需要的正確態度。



主流和支流的辯証法

高 禹

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看問題要善於區別主流和支流，區別十個指頭中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這是用辯証法觀察事物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在總結一件工作的時候，說明所取得的成績，又指出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在給一個同志做鑑定的時候，指出他的優點，又指出他的缺點。這都是必要的。在這樣做的時候，還必須根據事實指出，在成績和錯誤、優點和缺點這兩方面中，哪一方面是主要的，是屬於根本性質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不是屬於根本性質的。越是複雜的事情，越是需要做這種具体分析。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廣大幹部和人民群众的艱苦奮鬥和辛勤勞動，在各個時期和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和成績。儘管在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這些缺點和錯誤同成績比較起

來，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這是人們不能隨意否定的客觀事實。用九個指頭來形容我們工作中的成績，用一個指頭來形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合乎我們工作的實際情況的。

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用各種方法向党、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他們所使用的“攻其一點，盡量夸大，不及其餘”的方法，最容易迷惑一部分中間分子。看起來，他們好像也有一點事實根據。他們把事實上只是一個指頭或半個指頭的缺點和錯誤，盡量加以渲染，企圖使人們看不到另外的九個指頭，力求造成十個指頭一無是處的印象。但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這種方法，只能暫時地迷惑一部分中間分子。經過辯論，人們看清楚了我們的事業的全貌，人們也就看清楚了右派分子並不是反對我們事業中的缺點和錯誤，而是反對我們的事業本身。右派分子從反面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使我

們懂得，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區別主流和支流是多麼重要。

右派分子把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混淆起來，當然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進行分析和區別，而是因為他們站在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立場上。但是也有一些人，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因為他們的頭腦里，形而上學的東西太多，辯証法的思想太少，以至弄到分不清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他們習慣於孤立地、片面地看事情，而不善於把事情的全方面聯繫起來作全面的觀察。當他們看到一個指頭的缺點的時候，眼睛前面就是只有這麼一個指頭，正好象一葉蔽目，不知有天的情形一樣。他們這樣看問題的時候，儘管在主觀上是擔心這些缺點有害於人民的事業，但實際上是把一個指頭的問題誇大為九個指頭，甚至是十個指頭，而把成績以及取得成績的成功經驗否定掉了。這樣，他們勢必對人民事業中的某些缺點的改正失掉信心，對人民事業發生懷疑。他們的這種錯誤看法，雖然一般地是屬於思想方法上的問題，他們和站在反動立場上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破壞人民事業的敵人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這種看法如果不改正，也是很有害的。



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看清楚了工作发展中的主流，我们才能正确地掌握繼續前进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說可以不注意非主流方面的問題。毛澤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中指出：“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將这些看成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很显然的，如果因为看不清楚主流而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也就不会有能力去理解和解决非主流方面的問題。

在我們的事業中，不仅一个指头的缺点和九个指头的成績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它們之間是密切地联系着的。我們的事業是在无限兴隆地向前发展，我們是在做着我們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每一步新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新的問題，由于我們对这些新的問題还缺少經驗，也就难免在实践中发生新的缺点。而这些缺点的被发现和被克服，反过来又把整个事业更向前推进。也正因为如此，我們說，我們的缺点是向前发展、向前进步的过程中

的缺点。抱着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人，不从联系中看事情，也不从发展中看事情，結果他們既看不見九个指头的成績，也看不清楚一个指头的缺点的性質。

我們的工作成績是九个指头，缺点不过是一个指头，这并不能使我們满足于已有的成績，更不能因此而对存在的缺点不加理会。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也有些同志往往只看到成績，看不到缺点，这是另一种片面性。他們認為我們的工作一切都好，那怕一个指头或半个指头的缺点也不会发生。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就会使自己驕傲自滿和盲目乐观，就会使实际上存在的缺点得不到克服，以至使小缺点变为大缺点，进而发展成为大錯誤。片面地肯定一切和片面地否定一切的思想方法一样，也是对事情缺乏具体分析，絕對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学方法。

党时常教导我們，成績愈大，愈應該正視和改正工作中那怕是微小的缺点。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全民全面大跃进的一年，是获得了空前的成績的一年，但我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就指出：“我們决不能因为有了大的成績就忽視小的缺点。相反，成績愈大，我們愈需要提醒干部保持冷靜的头脑，不要在一片

胜利声中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至看不到，甚至不願意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們不怕揭发缺点和錯誤，是和我們看到自己取得的伟大成績相联系的。

取得成績的同时，必然也取得許多的成功經驗。我們有了伟大的成績，并掌握了取得成績的經驗，就有了克服缺点和錯誤的力量，就能够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績。人民的事業本身包含着无限的生命力也表現在这里。

事实正是这样：只看見一个指头的缺点，看不見九个指头的成績的人，虽然自以为是为了克服缺点，但你既然看不見九个指头的成績，你又从哪里找到克服缺点的力量呢？你既然看不見事物的本質和主流，你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險，更哪里会有克服缺点的把握呢？

所以我們一定要学会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相互关系上全面地看問題，这样我們就能够分清主流和支流，而不至于迷失方向，而且也能够依靠九个指头的成績来克服一个指头的缺点。当然，各个人是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观察問題、处理問題、发表意見的，有时候难免有点片面性。但是，只要我們努力学习辯証法，逐步地克服片面性，使自己看問題比較全面一些，是能够办到的。



共产国际成立四十周年

程 容

自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年了。这四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广泛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决定人类历史的强大力量。

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各国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思想基础，奠定了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各国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条件下，恩格斯和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成立之后，曾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加强了各国工人政党之间的联系，因而推动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国际成立不久，恩格斯就去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正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却落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手里。这些机会主义者依附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毒

害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投降的道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们更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出卖工人阶级，背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斯图加特决议和巴塞尔宣言，在议会中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所把持的第二国际，也就彻底破产了。这时候，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发动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英勇斗争。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于各国社会党左翼，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样，在第二国际破产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真正共产主义力量，就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和壮大创造了新的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时候，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外，在其他各国共产主义力量还没有建立广泛的群众联系，还不能够有力地抗击第二国际的叛变而独立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许多国家内，共产主义力量还同



机会主义力量共居在一个政党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当时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实行公开的彻底的决裂，就不能保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恢复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就不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担负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成立起来的。

共产国际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方面，在帮助各国先进工人组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方面，在恢复和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方面，都起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作用。

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真正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对于当时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就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在欧洲和世界各国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但是，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起义，却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没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的伟大功绩，首先就在于它帮助了各国先进工人建立了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并且帮助了这些政党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四十年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

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手订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列宁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原理，在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列宁曾经指出，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列宁也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工农联盟，依靠广大农村劳动群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援助，才能够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列宁也一再提出，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参加和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援助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联合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列宁阐明了工人政党在议会斗争、工人运动、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相结合等方面的策略原则。在这一切问题上列宁进行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保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些根本原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也就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思想的基础。它们已经成为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至今仍然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论述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时曾经指出，共产国际不仅在资本主义各国保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各国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在东方各国援助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政党。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各个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见“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宣布解散。这是因为客观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已经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已经成长和成熟起来。原来的国际联合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情况了，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成为不必要，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共产国际解散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毛泽东同志当时曾经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反动派曾经妄想，共产国际的解散，会使得各国

共产主义的事业遭到困难。但是，事实上，从那时候以来，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却更加蓬蓬勃勃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两洲出现了一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已经在这些解放了的国家里变成了现实。它们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起组成了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鲜明的旗帜。各国共产党都把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经常的重要的任务。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团结。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间，苏联和欧洲几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曾经组成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举行的一次最广泛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反映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团结和空前高涨。为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所赞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一致地进行了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正是继承着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牌修正主义



者衣鉢的叛徒。他們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無恥勾當，替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服務。在反對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從自己的隊伍里清除了叛徒，空前地加強了國際共產主義隊伍的團結。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制訂了蘇聯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現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而燦爛的前景。各國兄弟黨在代表大會上的致詞，生動地表達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和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致。赫魯曉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束語中，有力地駁斥了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挑撥離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謬言。

各國共產黨的相互關係既是聯合的，又是獨立的，是聯合和獨立兩方面的統一。所謂聯合的一面，就是說，各國共產黨都要堅持而不可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都要進行而不可脫離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都要發展而不可損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都要維護而不可削弱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所謂獨立的方面，就是說，各國共產黨總是面臨着不同國家的革命問題，總是要獨立地進行本國的革命鬥爭，總是要充分代表本國人民的願望和利益，總是要獨立地決定適合本國特點的方針和政策。各國共產黨互相聲援共同的

鬥爭，但是它們不干預彼此的內部事務。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由於各國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的不同，各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方面的區別，各國共產黨人必須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正確的領導，引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

各國共產黨都是國際共產主義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他們領導的革命鬥爭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的革命經驗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財產。現代修正主義者企圖用各國共產主義事業的民族特點來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一致，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毫無共同之點的。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說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共產主義革命”。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大火。今天，存在在世界上的再也不是少數國家的共產主義小組，而是一支包括八十三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三千三百萬黨員的強大隊伍。今天，存在在世界上的再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是以蘇聯為首的包括歐亞兩洲十二個國家的強大的、團結一致的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都看到了人類美好的未來——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繼承着共產國際偉大事業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正在為和平、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事業而進行不懈的鬥爭，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实行成本核算的商榷

趙 璧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曾經指出，人民公社“無論在那一方面的生产中和基本建設中，都必須厉行節約，精打細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工作人員因为丰收而发生鋪张浪費的現象。”实行成本核算，是貫徹执行这个重要指示的有效方法，是人民公社管理好生产事业所必需的。

产品的成本，就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以货币形式表現的全部开支，其中包括所消耗的物質資料的价值和所支付的工資或者劳动报酬。国营农場历来有成本核算的制度。人民公社內部要实行成本核算，也不是很困难的；因为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后，已經建立起許多經濟核算的制度，有了一定的财务會計制度，一定的統計工作等等。虽然这些工作还是不够完备的，例如，絕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某些副产品的收入和分配都沒有記賬，沒有計算和扣留过固定資產的折旧，沒有分別不同的产品来进行核算等等；但是，底子总算

是打下了，今后是如何向前推进的問題。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人民公社以后，条件比过去好了，會計人員比过去大大地加强了，成本核算是可以逐步推行的。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人民公社中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还不善于运用經濟核算的方法，去管理各种經濟事业。已經建立起来的某些經濟核算制度虽然提供了不少的資料，但是他們还不善于分析比較这些資料，来改进各个生产經營部門的經濟活动。經濟工作既然必須越做越細致，核算也就必須越来越具体。有一些同志覺得，实行成本核算太麻煩了。实际上，當我們实行了成本核算，認真地对各个生产单位和各种产品的成本进行分析比較之后，我們就会发觉这不是一件麻煩事，而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事情。

概括起来說，农村人民公社內部实行成本核算，有三个重大的作用。

第一，产品成本这个綜合性的經濟指标，是衡量經濟工作質量好坏最重要的尺度，它能够比較全面地、比較准确地反映出生产經營的狀況。有了成本核算，人民公社



的各级领导者就会了解各种产品生产中活劳动消耗和物资资料消耗的情况。通过对成本的分析比较，便会发现为什么这个生产单位比那个生产单位成本高了或是低了，为什么今年的成本与去年的成本相比较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也就会从中寻找答案，得出结论，获得教训，采取措施，把资金运用得更合理，把劳动力组织得更适当，找出节省人力物力的途径，并使生产规划制订得更加妥善。这样，也就会加速进行技术改革，努力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和方式，使人力、物力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使土地利用得更加合理。其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比如山西省沁安县一九五八年初曾在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农产品成本核算。当时南呈乡建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现一九五七年农药费用特别大，而在各种作物的农药费用中又以玉米地用得最多。追查原因，是由于玉米螟虫为害极大，在治这种虫害时，只注意用药剂治疗，忽视根治。因此，党支部和社委会便立即动员全体社员进行了烧茬、封轴等根治措施。河头乡前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成本核算，感到每亩用工过多，原因是该社畜力很缺乏，又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大部分耕作全靠人力。根据这个分析，定出了增加耕畜、改进农具的办法。微子镇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原计划一九五八年种春茬豆四十八亩，通过核算成本，发现单独种这种东西不合算，就改为在其他作物里间种

和等到麦收以后在麦茬地里种豆子，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利用。

实行成本核算以后，人民公社各级管理机构，就有可能在安排生产计划的时候，同时制定成本计划，作为生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成本计划，就便于对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更加周密的统筹安排，更加切实地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人民公社各个生产单位，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利用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比较，更好地贯彻执行节约的原则。

第二，实行成本核算，对于更加恰当地处理收益分配当中关于公共积累和社员消费、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的问题，也有很多好处。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那种不很完备的经济核算，也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没有成本核算，生产开支的计算是不够准确的，因而积累的计算也是不够准确的。实行成本核算以后，这一些就可以搞得很清楚，而国家、公社、社员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否适当，能够以多大的规模来扩大来年的再生产，社员消费部分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一些問題，因为有了更加准确的根据，就可以更妥善地得到解决。

第三，农产品成本资料，还可以作为国家制定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参考。目前农村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它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国家在制定各种农产品价格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价值规律对生产发生的某些作用，以便利用这种作





規 划

梁玉龙

用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也就不能不考虑到产品成本这个重要因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我們也正是这样地进行工作的。但是，那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还没有实行成本核算，在工作当中难免要碰到許多困难。如果人民公社内部实行成本核算，有了关于各种农产品成本的大量資料，就可以使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制定得更加合理，使之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个别人民公社的成本水平不能作为国家制定价格的直接依据。但是，如果所有的或大部分人民公社内部都实行了

成本核算，他們所提供有关成本的材料，就可以成为国家制定价格的根据了。

人民公社实行成本核算的目的，与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目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企业以追逐利潤为其一切經濟活动的目的，其所以要进行成本核算，也只是为了利用这一方法，謀求高額利潤。我們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目的，概括地說来就是为了节约劳动、增加积累、提高社員生活水平，是为了更好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成本核算，对于人民公社是实现节约目的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为了用尽可能少的开支去取得高額的产量和收入。决不能在实行了成本核算之后，弄清了各种产品的盈亏状

况，便去盲目地追求高額利潤，結果使国家的生产計划遭到破坏，使社会的整体利益蒙受損失，反过来也会得不到自己所謀求的高額利潤。人民公社的經濟活动，必須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一切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正如李先念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紅旗”第二期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經濟核算有整体的核算，有局部的核算，社会主义的赢利有高級的赢利，有低級的赢利。必須局部服从整体，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个原則，不但适用于人民



公社的商品性生产，同样也适用于人民公社的自給性生产。

人民公社現在需要实行成本核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类似的核算。这是因为，現在計算成本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产品生产中的各种开支，开支的节省归根結底是劳动時間的节省，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已經很高，人們从事劳动的时间將比現在少得多，从这个意义來說，每一个单位劳动時間將要比現在貴重得多，而对劳动時間节省的要求，也必然愈加严格。不过那个时候的核算，可能不再采取現在的价值和貨幣形式，而直接采取劳动時間的形式，也不是計算某一生产单位，或者从事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是亏是賺，而是計算这一生产单位或者从事这一种产品的生产耗費了多少劳动時間。形式虽然可能变化，但为了更好地实行節約，核算肯定是有需要的。

农产品的成本核算，在国营农业部門已經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核算方法。但由于人民公社当前的集体所有制性質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内部进行农产品成本核算的时候，在內容和方法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和国营企业不同的、比較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在目前还没有比較肯定的、一致的方案。現在在这里根据局部調查和研究的結果，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不成熟的意見，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关于劳动的估价問題

产品成本由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質資料的价值和所支付的工資或者劳动报酬构成。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現在的某些人民公社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定工、定产、定成本，其中所說的包成本和定成本，通常所指的只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物質資料，应当說，这不能叫成本，而只是成本的一部分。在产品成本中必須把工資或者劳动报酬的支出包括在內。如果不包括这种劳动报酬的支出，便不能得出完备的、正确的成本，便不能通过成本核算对活劳动消耗进行监督。在目前农业生产的各种生产支出当中，劳动报酬或者工資的支出占着很大的比重。成本核算不包括劳动报酬，是极其残缺不全的。

人民公社的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消耗量按照什么标准来估价，这是一个应当解决的問題。对这个問題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就已經存在着許多不同的意見。

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如果采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劳动报酬来計算成本，是有缺点的。首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报酬不稳定，而且不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报酬水平相差很大；同一个生产单位的前后成本中劳动报酬的支出的变化，和不同生产单位成本中劳动报酬的支出的差別，并不能相应地反映活劳动消耗量的变化和差別，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經營



效果的好坏。其次，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質，在社員所取得的劳动报酬中，包括着一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級差地租收入。由于客觀条件比較优越所获得的級差地租，轉为社員劳动报酬的那一部分，是不应計入成本的。

因此，有人倡議采用貨幣和劳动两个指标来核算成本，即物質資料消耗采用統一的貨幣形式計算，劳动消耗則不进行貨幣估价，保留其原来劳动日或工作日的形态。一定单位产品成本等于若干元又若干个劳动日或工作日。这样，实际上等于維持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包工、包成本的核算方法，而沒有再前进一步。成本既然是在价值形态上来表現生产过程的各种各样的消耗，就应当是一个統一体，就不宜于采取两种尺度来衡量它。用两个指标計算出来的成本，不便于彼此进行比較。比如說，甲社生产一百斤的某种产品，成本为三块钱又三个劳动日，乙社为两块钱又四个劳动日，丙社为四块钱又两个劳动日。在同一生产单位不同年度之間，也有类似的差別。这样就很难辨别那个成本高，那个成本低，那个比較划算，那个不划算。用这个方法計算出来的成本，也无法和价格进行对比，因此也就算不出是赢利还是亏本。这并不是不贊成对活劳动消耗量单独进行核算。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在的人民公社，都有劳动规划，都需要对某一项生产的劳动消耗量进行核算。但是，既然要計算成本，就应当計算劳动支

出，就应当把劳动消耗量統一換算为貨幣的支出。

有人主张以国营农場平均日工資做标准，主要理由是它比較稳定，它不包括級差地租。我們曾进行过一些調查研究。在我国現阶段的具体条件下，采用这种計算标准不符合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的实际，因而存在很大的缺点。第一，不論是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现在的人民公社，社員的劳动报酬一般都較低于国营农場工人的工資水平；如果以这一标准計入成本，而又使成本得到补偿，那就要由此得出提高劳动报酬，降低国家积累或者是社的公共积累的不正确結論。第二，要逐步推行成本核算，就必须使人民公社感到成本核算符合它們的情况，因而对它們的經濟工作有所帮助。以这种与公社无关的标准去計算农产品成本，人們会感到沒有意思，所以难以实行。

人民公社在成本核算当中，以实际支出的工資、供給或者劳动报酬作为劳动估价的标准，是比較适当的。理由是：这样做符合人民公社經濟活动的实际。当然，我們决不是主张以一个公社的成本作为一般公社的成本。在一般和个别当中，实际也是存在着差別的。但是，要确定一般公社的成本，就必须首先考察若干个别公社的成本。就每一个个别的公社來說，在核算成本的时候，又必須以它的实际开支为依据，否則，脫离了实际，这种核算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个别考察的



結果，絕大多數公社劳动報酬的水平已經和国营农場的工資水平一样了或者接近了，那么，在某些需要确定一个一般成本の場合，例如在国家制定物价和稅收水平的时候，也不妨以国营农場的日工資作为劳动估价的标准。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們既要掌握条件优越的公社的成本資料，也要掌握条件很不优越的公社的成本資料，既要掌握丰年的成本資料，也要掌握歉年的成本資料，这才不至于陷入片面性的錯誤。而所有的这些成本資料，都必需是符合实际的，这才不至于陷入主观主义的錯誤。

不錯，人民公社按照实际的劳动報酬来核算成本，存在着劳动報酬支出不够稳定和包括一部分級差地租的收入这两个問題。丰年和富村的劳动報酬支出多一些，歉年和穷村的劳动報酬支出少一些，这本来是一个客观存在，我們必須忠实地反映它。这样，在比較丰年和歉年、富村和穷村的成本資料的时候，不能够直接看出活劳动实际消耗量的多少。要回答这个問題，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比較实际劳动消耗量。无论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在的人民公社及其各个生产队，都有劳动消耗的記載，要进行比較是并不困难的。况且，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劳动報酬支出不稳定的問題，将一步步地得到解决。第一，公社抗御灾害的能力日益提高，收入日益稳定。第二，公社的积累将日益增加，工資基金将逐步建立。第三，大多数公社实行了伙食或粮食

供給制，这部分支出是比較稳定的。因此，工資和劳动報酬的不稳定状况将逐渐消失。在目前阶段，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一般还是以管理区或者生产队为单位各計盈亏的，級差地租还要存在一个时期。但是，随着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逐步发展，随着集体所有制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級差地租也将逐渐地趋于消失。

二 关于基本建設的劳动問題

在人民公社的劳动支出总額当中，基本建設劳动的支出占有不算小的比重。在去年的大跃进中，基本建設劳动的数量，更有极大的增长。据一九五八年在山西潞安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調查，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日和用于基本建設的劳动日比例是这样的：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是十比一点一三，一九五八年是十比五点五八；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是十比零点八二，一九五八年是十比二点一。这就是說，在平常年，用于基本建設的劳动日約等于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日的十分之一，而在一九五八年，則等于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但是，劳动報酬的总額并没有成倍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基本建設劳动和生产劳动加在一起，去計算每一个劳动日或工作日的开支，那么，这种开支的水平就会大大降低，在成本核算方面，就会引起假象的成本降低。从表面上看来，



基本建设的劳动报酬，应当从公积金里去开支。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实际上并不是等到积累了大量的公积金，才去从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它们动员社员群众自觉地从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劳动，而不必支出额外的工资或者劳动报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虽然没有提出苦战三年的口号，也有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基本建设劳动比往年多了，不愿意降低每个劳动日的报酬量，而采取大家分摊义务劳动日的办法。因此，在计算劳动报酬支出的水平的时候，不应当把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劳动加进去平均计算。至于通常数量的基本建设劳动，因为历年来都是和生产劳动算在一起去分得报酬的，还照旧加进去平均计算，是比较妥善的。

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劳动，就其经济实质看，是积累公积金的一种形式。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对于用基本建设劳动所创造的新的固定资产，往往也不计算收入，不计入总产值和总收入中，只是在使用价值形态上形成一种追加的公共财富。为了更正确地计算人民公社的全部财富，为了准确地计算农产品成本，基本建设劳动的收入应该加入基本建设总价值中，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折旧的办法计入产品成本。

三 关于固定资产的折旧问题

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固定资产

折旧这个项目。固定资产的损耗是由公积金补偿的。这在当时固定资产为数不多的情况下，为了减少麻烦，是合适的。公社化以后，经营规模扩大，社办工业增多，工具改革不断发展，固定资产已有并将有很大的增加。如果再不计算固定资产的折旧，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年终分配的时候看，公积金增加得很多，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抵充固定资产的损耗去了，真正的公共积累的增加，比年终分配时所扣除的公积金，要少得多。为了比较正确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使积累的速度呈现得更清楚，有必要改变现在用公积金补偿固定资产损耗的办法，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固定资产的损耗采取了折旧办法补偿以后，公积金就名符其实的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了。

从成本核算的观点来看，不建立折旧制度是不行的。因为，固定资产的损耗，是生产开支的一部分，在固定资产很多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在整个生产开支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今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这一部分开支的比重，还会日益更大，不计算这部分开支，就不可能把成本算得正确。

为了进行固定资产的折旧，需要适当地划分固定资产的界限。界限不要规定得太宽，使折旧工作过于繁杂；也不能太窄，使固定资产的损耗不能合理地计入成本。同时，也要适当地规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凡固定资产本身有设计使用年限的，



依設計年限計算折舊率；沒有設計使用年限的，可以根據經驗估計一個使用年限。在工具改革中將要淘汰的工具，年限應當定得低一些。另有一些固定資產，使用年限極長的，例如水庫、河渠等，可以定一個最高折舊年限，或者是只將當年消耗的維修費用計入成本，不進行折舊，這也是可以的。

四 關於勞動報酬的支出是否包括供給部分的問題

目前絕大多數人民公社的勞動報酬的支出包括兩部分，即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人民公社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以後，過去社員以家庭為單位收入和開支的有些項目，逐步為集體收入和開支所代替。人民公社的這一部分供給，實質上屬於償付活勞動的範疇，所以仍然應該把它包括在勞動報酬的支出之內。但是，人民公社的供給，還有一小部分是從公益金直接開支的，例如婚葬的補助支出等等。這些開支，就不應計入勞動報酬的支出之內。

五 關於自產自用的產品如何估價的問題

人民公社自產自用的產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價格規定得是否恰當，關係到勞動支出和物質資料支出的多少，關係到成本和收入的對比，還關係到工農生活水平的比較。不能認為自產自用的產品可以

作價也可以不作價，價格可以高也可以低，反正肉爛在鍋里。作價的根據，有這麼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按成本價格計入成本，因為這是人民公社生產這些產品的實際支出。如果按購進同類產品的價格計算，在購價高於成本的時候，在成本中會增加一筆虛假的開支，而在收入中又增加一筆虛假的收入；在購價低於成本的時候，一部分生產中的實際開支又不能計入成本之中，而在收入方面也不能按照實際情況打足。另一種主張是按國家收購價格或根據歷史習慣估價，因為這是社會所承認的，也是人民公社計算其收入時的一般作價原則。兩者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收購價格低於成本的情況是極少見的，一般以採用後者較為簡便。

* * *

要實行成本核算，還得解決許多具體的問題。以上所說的五個問題，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其餘的問題，就只好從略了。

上面所提到的主要是人民公社內部農產品成本的核算問題。至於人民公社的其他生產經營部門當然都應當進行成本核算，只是因為工業、商業等部門的成本核算已有先例可循，不需要做更多的敘述。人民公社的一些事業單位，如食堂、幼兒園、敬老院等等，雖然不一定進行成本核算，但也要利用其他形式進行一般的經濟核算，以便使資金運用得更加合理，勞動力安排得更妥當，把這些事業辦得更好。

